

【秦汉史研究】

论秦、西汉国家“以关中制山东”的对内防御战略

宋杰

【摘要】为了防备六国旧贵族豪强和诸侯王的反叛,秦与西汉政权均将关中(山西)作为基本经济区和都城所在地,采取了“以关中制山东”的对内防御战略。一是在“关中”与“关外”东西两大区域的分界线上设置了“五关”防线,派兵驻守盘查;二是以关西人为主组建国家的主力军队“北军”和禁军,屯驻在都城附近;三是在荥阳、洛阳设立敖仓与武库,并采取“广关”之举措,来扩大首都与基本经济区的防御纵深;四是于关外的中间地带设置郡县以阻隔诸侯王国,运用各种措施削弱王国势力;五是采取强干弱枝之策,迁徙六国旧贵族、豪富到关中;六是在关中大兴水利和推广农业先进技术。这一战略在西汉获得成功,但在秦朝和新莽遭到完全的失败,至东汉初年被朝廷放弃。

【关键词】秦;西汉;关中;山西;山东;基本经济区;津关令

【作者简介】宋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9)。

【原文出处】《军事历史研究》(京),2022.2.46~61

中国历史上的各代政权为了保障自身安全,需要根据面临的形势来制订具有针对性的防御计划,用以克制国内外敌对势力。在帝制时代初期,秦与西汉王朝(包括接替它的新莽政权)的国防战略大致相同,分别将都城咸阳、长安设置于渭河平原,以关中为根据地,对外在北边修筑长城烽燧,屯驻戍卒,防备匈奴的侵掠;对内则奉行“以关中制山东”的战略,视六国(齐、楚、燕、韩、赵、魏)故地的贵族豪强为假想敌,“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①。不过,秦汉时期的匈奴虽然猖獗,也只是在边郡劫掠,事毕即撤回塞外,并没有侵占领土、颠覆政权的企图。如阏氏对匈奴单于冒顿所言:“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②但山东势力一旦举事,轻则分疆裂土,自立为王;重则聚集大军西向入关,与中央王朝争夺统治天下的权力,其威胁往往是致命的。如汉初淮南王英布反叛,谋士薛公对刘邦说:“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③因此,对秦、西汉帝国来说,

策划并实行完善有效的对内防御战略,是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其意义十分重要。目前学术界多就秦、西汉对内防御战略的某个方面展开分析^④,综合性的专论^⑤较少,笔者拟对该战略进行系统论述,敬请同行师友指正。

一、秦与西汉的基本经济区“关中”

自战国中叶商鞅变法以来,秦的国势渐强,秦孝公时尽收河西之地,秦惠王又派将军司马错占领巴蜀,此后中国大陆逐渐形成“山西(关西)”与“山东(关东)”抗衡的政治地理格局,一直延续到新莽末年。这东西对峙的两大区域以函谷关(今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或崤山(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东南)为界。所谓“山东”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包括函谷关或崤山以东广袤的六国故地,如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对赵王曰:“六国从亲以摈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以害山东矣!”^⑥后者则不含江南的“楚越之地”和燕赵北方山区的部分领土,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里把中国分为山西、山

东、江南,以及龙门、碣石以北4个区域^⑦,这里的“山东”就是狭义的,只有华北平原、山东半岛、南阳盆地以及山西高原的南部、豫西丘陵的东部。“山西”“关西”则专指秦国的故土,它以关中平原为核心,加上陕北、陇东和陇西黄土高原及汉中、四川盆地和豫西丘陵的西部。如苏秦对秦惠王说:“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嶠)、函之固。”^⑧汉朝的“山西”又被称作“秦地”,由于汉武帝开西南夷、进占河西走廊,其地域较秦朝更加辽阔。《汉书·地理志下》载秦地:“其界自弘农故关以西,京兆、扶风、冯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陇西,南有巴、蜀、广汉、犍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属焉。”^⑨

值得注意的是,秦汉的“山西”和“秦地”又与广义的“关中”为同义语,狭义的“关中”仅指今陕西的泾渭平原,如司马迁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⑩而广义的“关中”则包括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及巴蜀、汉中,占到秦汉国土面积的1/3。如《史记·货殖列传》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汉书·地理志下》曰:“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可见二者的概念是基本一致的。正因如此,当时人们也经常把“关中”和“山东”对称,如谒者鄂千秋曰,“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⑪。文士邹阳曰:“今天子新据先帝之遗业,左规山东,右制关中,变权易势,大臣难知。”^⑫

冀朝鼎曾经指出,古代中国各个经济区域当中,地位和影响最重要的那个区域就是所谓“基本经济区”,它是从秦统一到清朝中叶各个王朝统治天下的基础:“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⑬而基本经济区之外的其他区域则被他称为“附属经济区”或“次要经济区”。在秦朝和西汉时期,国家统治的重心和基本经济区就是广义的“关中”即“山

西”,它的两个农业发达地区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都号为“天府”,土壤肥沃,灌溉充足。前者“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⑭后者“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果实之饶。”^⑮一方面,它们为秦和西汉统治者兼并天下提供了丰富的人力与物资条件。如苏秦说秦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⑯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依靠秦地的兵粮补充才得以战胜项羽。如鄂千秋所言:“夫上与楚相距五岁,常失军亡众,逃身遁者数矣。然萧何常从关中遣军补其处,非上所诏令召,而数万众会上之乏绝者数矣。夫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⑰《华阳国志》亦称:“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收其精锐以补伤疾。”^⑱另一方面,关中周围有山河环绕,便于设置关塞以驻军防守,如果天下发生战乱,形势不利时可以据险而守,御山东之敌于关外,确保关中不失。局势有利时则能够发兵东下,乘高屋建瓴之势以摧破诸敌。例如,秦统一天下后,为了防备被征服的山东六国贵族和民众反叛,“斩华为城,因河为津,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以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⑲汉朝建立后,许多大臣建议把首都设在位于“天下之中”的洛阳,刘邦对此有所犹豫。谋士娄敬劝说他建都关中,也是依据上述理由。其曰:

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⑳

刘邦手下最杰出的谋士张良,也支持娄敬的上奏,力主把首都定在长安。他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

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刘(娄)敬说是也。”^②娄敬和张良的建议,均明确地提出了“以关中制山东”的战略构想,并且获得了刘邦的赞同而得以实施。“于是高帝即日驾,西都关中。”^③

二、秦与西汉“以关中制山东”战略的具体内容

古代中国国内的政治、军事斗争,往往在地域上表现为东西或南北两大集团的对抗,国家的对内防御重点是准备打击首都以外其他地区政治势力发动的叛乱。朝廷通常要在防御计划中事先确立未来战争的假想敌人,它会来自哪个地域?哪个方向?会走哪一条或几条路线?必须针对可能发生的情况预先部署兵力、调配物资与修筑防御工事,以保护政治中心即首都和基本经济区的安全,这是军事方面的战略考虑。而“战略”这个现代名词具有两个层面的涵义,即军事战略和所谓“大战略”,前者是统帅指挥作战的谋略,完全是从军事方面来考虑、制定和施行的,故其早期又被称作“将道”;后者则是国家从全局考量并实施的一种长远的总体规划,它的内容除了军事战略还有政治、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因而是宏观的、综合性的。秦与西汉实施的“以关中制山东”国策则属于后者,是一种大战略,认为最有可能爆发的叛乱将在山东(关东)一带发生,因此在军事上假设的强敌是山东诸侯、豪强、“盗贼(起义军)”,朝廷针对上述情况制定的对内防御战略包含了诸多内容。分述如下:

(一)在“关中”与“关外”的分界线上设置关津防线,派兵驻守盘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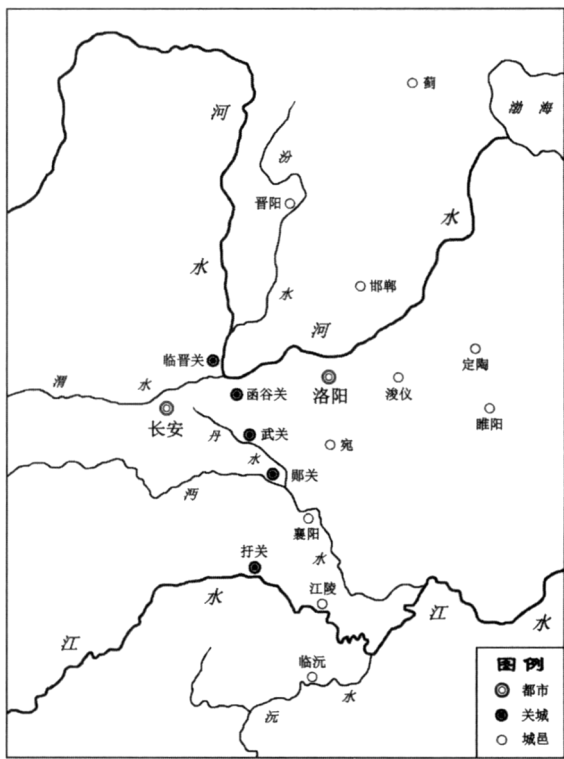
秦、西汉在“关中”之外的领土泛称“山东”^④,另曰“关外”。像秦始皇大修宫室,“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⑤亦见楚国贵族黄歇说秦王联楚,“王襟以山东之险,带以河曲之利,韩必为关中之候。”又云:“如此,而魏亦关内侯矣。”^⑥说明上述“关中”与“关内”同义,之所以在称呼上内外有别,是由于秦与西汉王朝都把关中视为帝国的根据地。秦汉的“关中”与“山东”即“关外”之间应当有一条较长的分界线,而不仅仅是函谷关或崤山这一个点。关

于上述问题,史书未有详细明确的记载。史念海曾论道:“作为东西对立的分界线,函谷关诚然是其中重要的所在,虽然重要,到底只能算是一个据点,不足以概括全面。”他认为“关中”一词的命名是与其周围的关隘有关,函谷关南北两方面的侧翼有沟通关中平原和南阳盆地的武关(西汉弘农郡商县东南、今陕西省商州市丹凤县东南),以及黄河西岸的重要渡口临晋关(西汉左冯翊郡临晋县东、今陕西省大荔市朝邑镇),这3座关大体上呈一直线。又云:“战国时期,东西对立开始形成之际,魏国据有河东,仍居于东方诸侯之列,其时秦地已东至于河滨,所以东西两方的分野界线,函谷关以北,即在河东、河西之间的黄河。这样一条界线经过秦统一六国之后,仍存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故楚汉战争肇始,这段黄河即成为汉军东趋的阻力。”^⑦史氏的论证非常精辟,他认为战国至汉初关中与山东两大区域的分界线大致沿晋陕边境的黄河南下至崤函山地,再南延至武关,这一观点后来被荆州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证实。

《津关令》反映的是西汉初年的制度,下限为吕后二年(前186年),其中数处提到“关中”“关外”以及两地边界上的“扞(扞)关、郟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或作“扞(扞)关、郟关、函谷[关]、武关及诸河塞津关”^⑧。律令中的“扞关”即古籍中的“扞关”“捍关”或“楚关”,位置在秦汉的鱼复县,即今重庆市奉节县境^⑨,是三峡西段瞿塘峡的出口,它起初为蜀国与楚国边境上的关塞,后来秦国灭蜀,则又为其所据。郟关在今湖北郟县东北,秦汉属汉中郡长利县。司马迁曰,“南阳西通武关、郟关”^⑩,表明郟关是汉中盆地通往南阳盆地的门户。“诸河塞津关”则应当包括了黄河龙门以下的夏阳、郃阳与临晋等诸津渡。《津关令》明确记载了“关中”与“关外”分界线上的各个关塞,即从晋陕黄河诸津南至临晋、函谷、武关、郟关和扞关,绵延千余里。“除临晋关稍偏西以外,其余四关由北向南,恰好构成一条大致端正的南北轴线。这五座关的位置,竟然都在东经110°与111°之间。”^⑪可以概称为“五关”防线。秦汉函谷、武关、江关(扞关)等地的军

事长官为领兵的关都尉，政府多遣酷吏（如宁成、尹齐、张敞）或重臣子弟（如丞相田千秋弟、黄霸与翟方进之子）担任此职。^④关塞被赋予的检查之责，又称为“阅”，对象为过关的人、畜、车、马、器物。如秦昭王时魏冉罢相出关到封地陶邑（今山东定陶市），“到（函谷）关，关阅其宝器，宝器珍怪多于王室。”^⑤《津关令》规定的各项制度以及所反映的东西两大区域边界之设置关防情况，应当是汉初继承秦朝的有关法令，属于一脉相承。其作用有四：

首先，防范东方势力的入侵。如贾谊所言：“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循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⑥贾氏又云：“所为建武关、函谷、临晋关者，大抵为备山东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⑦



西汉初年“五关”示意图

其次，阻止关中与山东之间人员的非法流动。秦、西汉时期，山东吏民经常要到关西边郡或都城咸阳、长安服兵役、劳役，事毕返乡；两地还有商旅往来贸易，这些都是合法行为，行者持有官府颁发的“符”“传”等证件通过关卡。但从《津关令》规定的内容与史籍相关记载来看，中央王朝在东西两大

区域的交界线上设置关卡，严格稽查，禁止不持或伪造“符”“传”证件的人员擅自出入，违反法令的人犯和官员要受到严惩。“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趾）为城旦；吏卒主者弗得，赎耐；令、丞、令史罚金四两。智（知）其请（情）而出入之，及假予人符传，令以阑出入者，与同罪。”^⑧这是为了防备山东诸侯派遣奸细入关刺探消息，以及杜绝关中的民众非法流入关外，或是阻截关中的豪强与东方的反叛势力串联勾结。如天汉二年（前99年）冬十一月，武帝“诏关都尉曰：‘今豪杰多远交，依东方群盗。其谨察出入者。’”^⑨

再次，向过关的人员及携带物品收取关税。例如武帝时宁成为函谷关都尉，开始对出入关者盘查征税，“关吏税肆郡国出入关者，号曰：‘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注引李奇曰：“肆，阅也。”^⑩也是搜查的意思。索取的关税一般作为守关官兵的生活开支。如太初四年（前101年），“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⑪对钱币货物征收关税的事例可参见汉代著作《九章算术》中的《衰分章》和《均输章》。

又次，《津关令》反映出西汉政府对“关中”即“关内”地区制定了严格的经济保护法规，禁止黄金、铜料、器皿、铁、马匹和大型弩弓等重要物资流出。例如，“制诏御史，其令扞（扞）关、郟关、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及诸其塞之河津，禁毋出黄金，诸莫黄金器及铜……”^⑫秦汉黄金和铜都是制造货币的重要材料，属于贵金属，朝廷禁止其流向关外，是为了保证关中基本经济区的财富积累。《津关令》又曰：“□、制诏御史，其令诸关，禁毋出私金器、铁。其以金器入者，关谨籍书。出，复以阅，出之。”^⑬私人携带金器进入关中，要在关津检查登记，再出关时按原来注册的“籍书”审核通过，才准许放行。铁可以用来制造兵器和农工器具，在汉代不仅被禁止从关中流往山东，也不许私出国境。例如“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⑭在北方边境亦然，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⑮用以保持关中地区在兵器、工具材料方面对山东与境外的优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削弱关东兵器的数

量,阻止当地势力反叛,“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④杨建认为,汉初《津关令》关于严格盘查金器、铜、铁等金属出关中之规定,与秦始皇“收天下之兵”有同样的目的。^⑤

《津关令》还“禁民毋得私买马以出扞(扞)关、郟关、函谷[关]、武关及诸河塞津关”^⑥。并规定关外郡国及诸侯王国若要在关中购买公用马匹,必须按实际需求向当地有关机构提出申请,经过审批后办理各种证明手续,方可据之出关。马匹在古代不仅用于乘骑耕作,还具有重要的军事用途,其数量多少能够决定骑兵力量的强弱,因而也属于朝廷严格管控的战略物资,被限制流往诸侯王国。如贾谊所言:“所谓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法,无资诸侯。”^⑦禁马出关的法令至中元四年(前146年)有所松动,“御史大夫(卫)绾奏禁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注引服虔曰:“马十岁,齿下平。”^⑧是说10岁以下、或高5尺9寸以上的马匹被禁止出关,即限制年轻力壮的高头大马流往山东。这条禁令到始元五年(前82年)才被废除,当年夏,“罢天下亭母马及马弩关”^⑨。所谓“亭母马”是官亭饲养的母马,“马弩关”见该条孟康注:“旧马高五尺六寸齿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说明,过去拉力在10石以上的大型弩弓属于威力强大的重型武器,因此也被禁止流出关外。

(二)多以“关中(西)”人组建主力部队,屯驻于都城附近

秦朝、西汉的首都咸阳、长安,都设置在关中平原的中心地带,为了保护皇室百官的安全,朝廷在都城附近驻扎重兵,主要由“关中”(山西)人组成。但是秦与西汉的兵力部署有所差异。秦二世在关中“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⑩而且又把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驻守在咸阳北方的上郡(治今陕西省延安市),主要用于防备匈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六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于是渡河,据阳山,透蛇而北。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⑪《史记·匈奴列传》则曰:“后

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⑫施丁认为“十万之众”是蒙恬部下军队的数额,后来徙徙適卒充实河南地,约有20万人,故又有30万众之说。蒙恬死后,这支军队改由王离率领。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⑬因此王离所部只剩下原来的10万人,后来开赴河北与起义军作战。^⑭由于王离大军不在咸阳附近,猝遇变故赶赴不及。陈胜、吴广起义爆发后,周文率领义军迅速攻入关中,“西至戏,兵数十万”。^⑮二世麾下兵少而无法抵御,最后接受章邯的建议,赦免骊山刑徒、人奴产子组成军队与京师的“材士五万人”汇合,才勉强打败了起义军,度过危机。不过,使用刑徒、奴婢只是仓促应变之策。“后来在东方作战,秦一再补给章邯的,都是‘关中卒’及新征‘秦人。’”^⑯巨鹿之战前,章邯与王离所部同在关外作战,战役失败后投降项羽并被坑杀的“秦卒”竟有20余万人。

西汉初年与匈奴和亲之后,朝廷在都城长安附近设置南军和北军,这些军队分别来自山东郡国与关中的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郡)。易氏曰:“郡国去京师为甚远,民情无所适莫,而缓急为可恃,故以之卫宫城,而谓之南军;三辅距京师为甚迩,民情有闾里、墓坟、族属之爱,而利害必不相弃,故以之护京城,而谓之北军。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⑰南军由卫尉率领,起初有两万人,武帝以降裁至一万人。^⑱北军先后由卫将军、中尉和中垒校尉统率,担负着保卫京师和外出平叛的任务,其具体数额不明,学界认为至少有数万人,规模远超过南军。黄今言曾总结道:“汉初的诸吕之乱,周勃‘以北军安刘氏’;平定‘七国之乱’,以北军主力参战,而获胜;武帝晚年的戾太子(刘据)在京师发动叛乱,也因北军‘不肯应太子’,而太子失败。在汉代这几次重大的政治事件中,都与南北军有关,尤其是北军对稳定汉代政局的意义不可低估。”^⑲这种主要以关中人组成大军集于长安附近以震慑全国(主要是山东地区)的做法,被史家称作“居重驭轻”,被认为是“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⑳至于宫内的禁军,

更是专门从西北六郡选拔而出,而不用关外的山东人。“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⑥

(三) 扩大首都及基本经济区的防御纵深

秦、西汉王朝都城所在的关中平原,是山西(广义的“关中”)的核心地段,它是否有足够的防御纵深,是关系到朝廷生死存亡的重要问题。当时山东的经济、政治重心区域主要分布在黄淮海平原、胶莱平原和江汉平原,它们和关中平原之间,有一道地形复杂、海拔较高的中间地带,即山西高原、豫西丘陵山地和商洛山区、南阳盆地,这一地带的自然地形不利于大部队的运动与展开。秦与西汉前期在临晋、函谷关、武关一线设置的关塞,分布于上述中间地带的西侧。如果说武关后边还有峽关(今陕西省商州市西北)和蓝田可以据守,那么临晋关背后就是关中平原;函谷关西去百余里即进入关中,沿途只有秦汉时代基本上不设防的桃林(今陕西省潼关县以东),临晋与函谷都缺乏防御的纵向深度,特别是函谷关面对的豫西通道(自荥阳、成皋、洛阳、新安、陕州至函谷、桃林),沟通关中与山东两地之间的距离最短,因而在战国时期秦与六国诸侯联军交战中被频繁使用。函谷关一旦被打破,敌军往往就能顺利地进入关中平原。

秦朝在统一天下之后,就已经认识到函谷关方向防御纵深不足,它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是设置三川郡,将整个豫西通道包括进去,单独进行行政、军事上的管理,并委派丞相李斯的长子李由担任郡守,来镇抚这一重要的战略防区。同时在豫西通道东口的荥阳预先设立巨大的敖仓以储备粮草,如果关东有战乱爆发,可以凭借荥阳的坚城和敖仓的补给来固守,尽量阻止或拖延敌军进入豫西通道,藉以等待中央政府驻扎在关中的主力部队赶来支援。陈胜、吴广发动起义后,义军很快占领了六国故地,但对李由防守的荥阳与敖仓久攻不下^⑦,历时数月,大军被牵制在那里,陈胜不得已派周文分兵进攻关中,结果被章邯击败,秦军出关后解救了荥阳之围,

使陈胜、吴广所部伤亡殆尽。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仍然执行秦朝的这一战略方针,不仅继续在荥阳经营敖仓,还在它西邻的洛阳设置了储存兵器的巨大“武库”,敖仓和武库所在的河南郡由朝廷直接管辖,不分封给诸侯王。汉武帝曾据此制度拒绝了宠妃王夫人为其子在洛阳封王的请求,说:“洛阳有武库、敖仓,当关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来,传不为置王。”^⑧西汉时期,朝廷出现政治危机或是关外发生叛乱,统治集团往往迅速派遣大军赶赴荥阳,抢先控制这一战略要地。例如刘邦在临终前,“诏(陈)平与灌婴屯于荥阳。”^⑨惠帝病重时,“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太尉灌婴将。”^⑩吕后驾崩后,琅邪王刘泽与齐王刘肥合谋起兵西进,“欲诛诸吕。至梁,闻汉灌将军屯荥阳,泽还兵备西界。”^⑪文帝时济北王刘兴居举兵造反,“发兵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祁侯贺为将军,军荥阳。”^⑫随即平定了叛乱。景帝时爆发七国之乱。吴王刘濞部下桓将军建议:“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雒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⑬但吴王未听从其计,汉将周亚夫则疾速出关,会兵于荥阳,扼守吴楚军队西进关中的孔道,先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反击获胜。周亚夫占据荥阳后曾得意地说:“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⑭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见控制荥阳对于稳定山东局势的重要。

扩大关中地区防御纵深的另一办法,就是汉武帝采取的“广关”举措。汉武帝在位时,中央政权势力强盛,曾经将山西、山东两大区域的分界线即对内设置关津的防线向东迁移,借以扩大“关中”的地域范围与人口、财富。元鼎三年(前114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⑮函谷关原在今河南灵宝市,此次向东迁徙,“去弘农三百里”^⑯,改设在今河南新安县境,仍然使用旧的关名。另据《史记》记载,汉朝的这次举措被称为“广关”,不仅将函谷关向东迁移,而且其北部的界线亦从晋陕边境的黄河东进至太行山。“(代王刘义)十九年,汉广关,以常山为限,而徙代王王清河。清河王徙以

元鼎三年也。”^①此事又见于《汉书·文三王传》：“元鼎中，汉广关，以常山为阻，徙代王于清河。”颜师古注：“依山以为关。”^②邢义田对此论道：“这是两条很重要的证据。所谓‘广关’、‘以常山为阻’很清楚是以常山所在的太行山为界，太行山以西之地此后都是关中了。”^③此后的史籍仍可见相关记载，如阳朔二年（前23年）秋，“关东大水，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④天井关在今山西省晋城市南；壶口又称壶关，在今山西省壶关县西北；五阮关在今河北省易县西北，即紫荆关。这三关都在太行山麓。辛德勇分析：“天井、壶口、五阮诸关与函谷关相并列，显然这些关口和函谷关一样，起着分隔大关中与关东两大区域的作用。这里所说的函谷关，自然是指汉武帝移关后的新关；弘农郡东界上另有陆浑关，与此函谷新关南北并列，同样起着阻隔关中、关东两大区域的作用。”^⑤辛氏认为，函谷关的东移和太行山西侧地区被划入关中，大大增强了朝廷依托关中以控制关东这一基本防御战略之作用。不仅如此，笔者认为，“广关”在军事上也起到增加防御纵深的重要功效，把对山东的“五关”防线北段向外延伸到中间地带山西高原的东侧，使关中地区的防守态势获得了明显的改善。

（四）对同姓诸侯王的抑制与削弱

秦朝对关中和山东两地都实行郡县制，由中央统一管辖。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为了答谢韩信、彭越、英布等功臣，曾将关外领土分封给7个异姓诸侯王，数年后将其大多数翦灭。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刘邦又分封了9个同姓宗室为诸侯王，加上长沙王吴芮，分别治理广袤的山东。“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太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太行）山以东尽诸侯地。”^⑥其疆土北距长城，东沿海滨，南隔五岭。周振鹤指出，9个同姓王国与异姓长沙国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总封域占全汉疆域的一半以上，这时高帝自领地不过15个郡。^⑦

刘邦委任宗室去统治山东的目的，是希望这些与皇帝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能够镇压地方、拱卫朝廷并抵御胡、越等异族入侵；同时也是吸取了秦朝灭亡时没有同姓王侯在朝内及关外协助救援的教训。如班固所言：“（秦始皇）窃自号为皇帝，而子弟为匹夫，内亡骨肉本根之辅，外亡尺土藩翼之卫。”^⑧但是，刘邦对这些同姓诸侯王也怀有戒心，恐怕他们日后势力强大而与朝廷反目。如刘濞受封为吴王，有3郡53城。刘邦事后有些后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⑨按照贾谊的说法，诸侯王就没有不想做皇帝的。“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⑩为了防备山东的同姓诸侯王反叛，汉朝中央政府除了禁止黄金、铜铁和马匹、弩弓流出关外，还采取了如下重要措施：

第一，在关外设置郡县以阻隔诸侯王国。朝廷没有把山东的领土全部分封给诸侯王，而是在紧邻临晋、函谷、武关、郟关、扞关的地段设立了上党、河东、河内、河南、南阳和南郡，由中央直辖，以此作为诸侯王国与关中东部“五关”防线之间的隔离地段。梁万斌把关中诸郡称为“关中核心区”，关外汉廷直辖的诸郡和诸侯王国分别称为“关外直辖地”和“关外王国”。他指出，汉廷直辖的上党、河东、河内、河南、南阳、南郡等关外诸郡，不仅在地理上南北相连，而且位于“关中核心区”与“关外王国”之间。这样的空间布局，使得“关中核心区”与“关外王国”之间形成了一个军事缓冲区，为临晋、函谷等“五关”及其防线前面创造了一道屏障^⑪，上述“关外直辖地”分布于山西高原南部、豫西丘陵山地、南阳盆地与江汉平原西部，其自然地形较为复杂，或山陵起伏，或川流散布，不利于大部队的行进。汉廷将其地段划入中央直辖的郡县，在战乱爆发时可以使用当地的武装力量据守抵抗，借以阻击、延迟诸侯王国的军队前进，最终达到保护关中、制约山东诸侯王国之目的。<http://www.rdfyb.com/>

第二，运用各种措施来削弱王国势力。汉初诸侯王国相当强盛，“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

官观观,僭于天子”^⑧。像吴王刘濞起兵反汉时,在其国内征发了20余万人。朝廷为了削除他们的严重威胁,先后采取了各种有效的举措。首先是贾谊上《治安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⑨就是命令诸侯王的各位儿子分割继承封土,这样王国数量依次增多,而领土则逐步缩小,便无力举兵反抗朝廷。这项建议被汉文帝采纳,随后分齐国为七,淮南国为三。其次是晁错上《削藩策》,主张乘诸侯王违反法纪来削减其领土,“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⑩汉景帝采纳该策,以此削楚国的东海郡,吴国的豫章郡、会稽郡,赵国的河间郡以及胶西国的6个县,果然激起了“七国之乱”,被朝廷派周亚夫领兵扑灭。汉景帝随即在吴、楚、齐、赵故地立皇子13人为王,继续缩小其领土,同时“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⑪取消了他们的行政权和官吏任免权,使诸侯王在封国内只能享受租税,而丧失了实际统治权力。再次,汉武帝听从了主父偃的“推恩”建议,使诸侯王得以划分国土给众多子弟来做列侯,这样王国的领土更为缩小,势力愈发衰弱,靠近胡、越的王国边境也被划为郡县。“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⑫上述举措概如班固所言:“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⑬此后到王莽执政前再也没有出现山东诸侯起兵割据叛乱的事情了。

(五) 强干弱枝,迁徙豪族

秦、西汉在建国之初,都面临着山东六国故地旧贵族豪强的严重威胁,这些势力自春秋战国以来分裂割据多年,虽然先后败于秦始皇与汉高祖的统一战争,但仍拥有不容小觑的力量,对中央王朝的统治构成潜在的危害,因此秦朝与西汉统治者都对他们采取了强制迁徙到关中的打击措施。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下令,“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⑭若按一家5口估算,约有60万人。至三十五年(前212年)又命令:“立石东海上胸界中,以

为秦东门。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⑮丽邑在咸阳东南,是秦始皇陵墓所在地,云阳在今陕西省淳化县,有秦的行宫。另一处迁徙地点则是关内的蜀地,《华阳国志》曰:“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⑯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还有“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⑰

西汉定都长安后,关中地区因为经历了战争动乱而人口减少,北边又有匈奴的逼迫,娄敬因此向朝廷提出迁徙山东强宗豪族入关的建议。“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桀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⑱娄敬把它称作“强本弱末之术”,得到了刘邦的赞同。“上曰:‘善。’乃使刘敬徙所言关中十余万口。”^⑲这些人居住在刘邦的陵墓长陵附近。从此以后,迁徙山东豪富成了西汉王朝长期奉行的国策,从汉高帝九年(前198年)延续到汉成帝鸿嘉二年(前19年),共有10次,仅汉文帝与元帝时不见徙民。《汉书·地理志下》曰: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⑳

这段记载概括地说明了西汉徙民关中政策前后的变化,刘邦时迁徙到长陵的是齐、楚等六国旧贵族与功臣的家属,此后则逐渐演变为禄秩在2000石以上的高级官吏家属、符合一定财产标准(或300万钱,或100万、500万钱,因时而定)的富人以及称雄乡里、兼并土地的“豪杰”。

西汉政府迁徙山东豪富的措施成效显著,一方面,这些人离开故土,减少了在原籍聚众叛乱的潜在威胁。如主父偃所言:“富豪大族之所以强者,因其地也。诸田非勃海鱼、盐之利,不足以强;屈、昭、景非云梦泽薮之资,不足以强;世家非姻亚之盛、朋

友之合、小民之相比而相属，不足以强。弃其田里，违其宗党，夺其所便，拂其所习，羁旅寓食于关中土著之间，不十年而生事已落，气焰沮丧。”^⑤另一方面，豪富强宗移民到关中居住，既便于朝廷对他们的就近监控，又增强了京畿和基本经济区的人力与财力，可谓一举两得。秦统一前，全国的商业都市最著名的是同样号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和陶邑（今山东省定陶市）。秦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地区多年来以重农著称。“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穡，务本业。”^⑥经过西汉的屡次迁徙豪富，当地的商业获得了迅速发展，财富显著增加，出现了许多原籍山东的巨贾。例如，“关中富商大贾，大抵尽诸田，田亩、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万。”^⑦长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最大的商业中心。“郡国辐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⑧，经商获利成为京师百姓追逐的风尚。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山东地区虽然疆域辽阔，拥有更多的人口，但是在朝廷“强本弱末”政策的打击下，其拥有的财富相较于（广义的）关中，已明显处于劣势。如司马迁所言：“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⑨

（六）在关中大兴水利、推广农业先进技术

冀朝鼎曾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⑩朝廷往往额外加大对该地区水利灌溉设施、水旱交通道路等公共事业的建设投入，以便增强它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和支配作用。

秦朝和西汉时期，关中由于是首都所在地，又属于基本经济区，从而获得了国家许多特殊的待遇，它的经济繁荣是在征调各地人力、财力的条件下优先发展起来的。当时关中本来就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西汉中央政府还要通过行政手段进一步强化这一地位，曾在关中修建大规模的灌溉工程和漕运的人工渠道，以此来促进构成关中经济优势，借以巩固其统治地位，这也是“以关中制山东”战略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据《史记·

河渠书》与《汉书·沟洫志》记载，西汉自武帝时起，先后修筑了与渭水并行的漕渠，从汉中通往关中的褒斜道与漕渠（未成功），由陕西澄城县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县的龙首渠，在郑国渠上游分流灌溉的六辅渠，引泾水从谷口到栌阳的白渠，以及灵轵渠、成国渠和漳渠，对促进关中农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山东各地却罕有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下令开凿六辅渠的时候，黄河由于早年在瓠子（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决口，已经在河南和山东泛滥了很长时间，造成了严重危害。朝廷没有把大量人力、财力集中投入到显然更为重要的堵塞黄河决口的任务上，反而先去开凿六辅渠。这一事实激怒了清代学者康基田，他在《河渠纪闻》中批评汉武帝不顾黄河堤岸失修和附近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危，而热衷于搞“一隅之利”的水利事业。冀朝鼎对此评论道：“康的批评，从人道主义的理由来说，完全是正当的。但也暴露了他对基本经济区在半封建中国中，对经济政治的枢轴作用是一无所知的。诚然，六辅渠只是‘一隅’之利，但是，那是重要的一隅，重要到足以能看成是基本经济区。受洪水破坏的这5或10郡，也许有较多的人口和较广的耕地，但这些地方与首都相距太远。在武帝采纳开凿六辅渠的计划时，他对这两个地区两项水利工程的利害关系所作的估价，表明了他对基本经济区的重要性有着多么深切的理解。”^⑪需要强调的是，黄河瓠子的决口是在堤防溃坏20年后才得以修复的。在此之前，汉武帝先后批准了在关中及附近地区大兴土功，修建褒斜道及漕渠、龙首渠。在这两项工程的建设都遭受挫折之后，汉武帝才亲自督促把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投入到黄河的堤防修复上，最后终于堵住了决口。

西汉农业先进技术的代表有赵过发明的“代田法”和二牛三人的耦犁，以及氾胜之的“区种法”。代田法的应用明显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斛以上，善者倍之。”^⑫它的试验是在汉武帝晚年从关中地区开始，收到成效后逐步推广。“是后边城、河东、弘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

田,用力少而得谷多。”^⑧值得注意的是,这项先进的耕作技术只是流行在广义的关中即山西地区,像长安附近的三辅、太常所辖陵县以及西北边郡,而河东与弘农两郡此时经过汉武帝的“广关”也已被纳入“关中”即关内的范围了。正如史念海所指出的那样:“秦汉时代农业技术的改革以赵过的代田法和氾胜之的区种法最为重要。直到西汉末年,区种法仅试行于三辅,代田法则三辅而外,曾在西北边地推广,山东似尚未沾其余泽。”^⑨

三、“以关中制山东”战略的成败与终结

秦、西汉还有新莽王朝奉行的“以关中制山东”在实际运用中收效如何呢?从历史进程来看,这一防御战略对于维持秦和新莽的统治基本上没有什么效果,它们都是短命政权,只存在了十几年,就被起兵于山东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西汉则有所不同,它延续了200多年,其间有几次山东地区发生的叛乱,都被朝廷轻易地镇压下去。例如,刘邦铲除异姓诸侯王、汉文帝镇压济北王的叛乱,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以后直到西汉被新莽取代,山东地区也没有发生过动摇帝国根基的大规模起义或叛乱。西汉亡于专权的外戚,而不是外部的山东势力,因此可以说它所执行的“以关中制山东”战略比较成功。那么,秦与新莽失败的缘故是什么呢?笔者分析,主要原因有以下两条:

一是政治方面的原因。秦、西汉“以关中制山东”战略的假想敌是六国旧贵族、豪富与诸侯王,它们的力量有限,如果仅仅是针对这股势力来实施上述战略,中央政权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可以说是以强凌弱、稳操胜券。但若是与山东的全体民众为敌,那么力量对比就会掉转过来,无论如何难以取胜。秦和新莽政权的统治残酷暴虐,激起了全国民众(主要是山东百姓)的激烈反抗。前文已述,关中的人数只占天下的3/10,山东则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如果遍地起兵,“云集响应,赢粮而景(影)从”^⑩,即使秦与新莽投入数十万军队镇压,最终也只能被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宋朝的何去非曾经评论过秦末农民起义与吴楚七国之乱的胜败原因,他认为就是由“民志”来决定的。山东人民不愿意接受秦朝统治,都想尽快推翻它,起义的

领袖顺从了他们的意愿。“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众亦锐于亡秦,是以豪杰之起者因民志也,关东非为秦役矣。”^⑪西汉政权并未实行暴政,全国百姓没有颠覆它的意愿,因此吴楚七国的叛乱未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汉无可叛之衅,而天下之民无志于负汉,则七国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为汉役者也。”^⑫如果说秦朝末年与关西故国民众的矛盾还不是那样尖锐,秦地百姓尚未爆发起义的话,那么对王莽的倒行逆施,就连关中人民也忍无可忍。绿林、赤眉起兵时,“三辅盗贼麻起,乃置捕盗都尉官”^⑬。绿林军打进关中后,“三辅豪桀共诛王莽,传首诣宛”^⑭。要是丧失了关内百姓的支持,还谈得上什么“以关中制山东”呢?

二是军事方面的原因。制定作战方略时,必须根据形势的需要来决定是进攻还是防守。“善为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则克,以守则固。当攻而守,当守而攻,均败之道也。”^⑮秦与新莽的统治者都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对山东起义军采取了倾注全力出关进攻的冒险战略,结果使主力军队在关外被歼灭,导致“五关”防线没有足够的兵力把守,加速了它们灭亡的进程。例如,在河北的巨鹿之战中,秦朝王离的10万军队被项羽打垮,章邯被迫率20余万人投降项羽,致使后来刘邦打进关中时相当顺利,并未受到重重阻碍。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在对抗战国时期的山东六国和陈胜、吴广发动的农民大起义时,面对的是迥然不同的作战形势,前者秦处于攻势,后者秦处于守势,“攻守之势异也”^⑯。面对貌合神离的山东六国,秦可以出关攻战,并能统一天下。但是与同仇敌忾的关东反秦浪潮对抗,秦朝的军队寡不敌众,是注定要失败的。在这种被动的形势下,如果将数十万秦军部署在“五关”防线闭门自守,还是能够拖延时日,不至于迅速瓦解。贾谊曾说:“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⑰他的评论得到了司马迁的认同。何去非在《秦论》中也提到,秦朝的灭亡是必然的,但是之所以迅速崩溃是因为战略指导上犯了“当守而攻”的致命错误。“虽二世之乱足以覆宗,天下之势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亟者,用兵之罪也。”^⑱他认

为秦国故土的人民遭受秦二世的危害还不深,他们勇于战斗、乐于保卫帝王的风俗仍然存在,章邯、王离等人部下的二三十万大军还有战斗力,“以攻则不足,以守则有余”^⑩。如果放弃关东,凭借山河关塞的险固来防御,秦朝在关内的统治还可以苟延残喘。“使其知捐背叛之山东,严兵拒关为自救之计,虽以无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区犹可岁月保也。”^⑪但秦二世与赵高谋划失误,把全部主力都投入到关外,导致“五关”防线甚至连都城咸阳都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来防守。“乃空国之师以属章邯、李由之徒,越关千里以搏寇”,孤军深入到河北、河南,“弃大险,渡漳逾洛,左驰右骛,以婴四合之锋,卒至于败”,终于陷入无法抵御的地步,而“沛公之众,扬袖而下控函关”。^⑫新莽末年的情况与秦有些相似,山东各地的农民起义爆发后,王莽先是派王匡、廉丹率10万军队东征赤眉,在成昌之战中大败。随后又遣王邑、王寻领42万大军征讨绿林,在昆阳之战中覆灭,朝廷的主力在关外丧亡殆尽。等到义军入关后,长安附近的豪杰纷纷举兵,不待绿林大军到来就打进城内,诛杀了王莽。朝廷若是将这几十万大军驻守在“五关”防线,起义军也不会轻易地进入关中,消灭新莽政权则尚需时日。

东汉建国伊始定都洛阳,到建武三年(27年)打败赤眉占领关中,但未返都长安,而是放弃了“以关中制山东”的对内防御战略,这又是什么原因?学术界对光武帝建都洛阳、舍弃秦与西汉“关中本位”的政策多有讨论,从各方面进行了分析。傅乐成曾对此有一段综合性的概述:“王莽末年,光武起兵于舂陵,从龙之士,皆山东人。他即帝位后,采取保守主义。因长安遭赤眉破坏,而其地接近外族,他的部下又都是山东人,因而定都洛阳。”^⑬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东汉初年没有继续奉行“以关中制山东”的战略,主要有以下原因:

其一,关中残破与基本经济区的转移。东汉王朝建立之际,关中地区受到的破坏极其严重,与秦、西汉统一全国时当地的情况大相径庭。绿林军占领长安后,关中的社会秩序尚算稳定。三辅悉平,更始都长安,居长乐宫。府藏完具,独未央宫烧攻莽三日,死则案堵复故。”^⑭次年赤眉攻入关中,迫降

更始帝,对三辅地区大肆焚掠。“赤眉遂烧长安宫室市里,害更始。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城中无人行。”^⑮至建武二年(26年)正月,赤眉因为乏粮离开长安西行,当年九月重返长安,“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⑯关中的人口大量死亡,生产停滞,西汉200余年的建设成就扫地无余,关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基本经济区的物质条件。前文已述,秦、西汉王朝建立时,都是以关中为根据地,凭借当地的丰富物产与劳力、兵丁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这是他们奉行“以关中制山东”战略的经济基础。但是光武帝刘秀起兵时,关中并不在他的手里,后来他平定四方,主要依靠的是河北地区的粮饷与人力资源。偏将军耿弇曾对刘秀说:“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李贤注:“《前书》曰:‘关中国所谓金城天府。’(耿)弇以河北富饶,故以喻焉。”^⑰这是把河北比作秦与西汉的关中,尤其是河内郡,更为刘秀所倚重。他曾对偏将军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⑱光武帝出征后,“(寇)恂移书属县,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⑲充分表明了这一地区对刘秀争夺天下的重要性。梁万斌曾指出:“幽州十郡的突骑与河内的财富,是刘秀争夺天下最为关键的两大凭藉。因此,河北是刘秀最终赢得帝业而必须固守的基地。”^⑳光武帝后来占领了关中,但彼时关中的经济和人口已被战乱摧毁殆尽,无法被东汉政权利用来制衡山东,刘秀又有新兴的基本经济区——河北,因而最终决定仍将都城设在距离自己河北根据地较近且又处于“天下之中”的洛阳。正如汉末杨彪所言:“更始赤眉之时,焚烧长安,残害百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㉑

其二,节省漕运耗费。关中平原虽然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但由于是京师所在,有皇室、百官、大量豪富与侍从奴仆,以及庞大的驻军、刑徒队伍和数十万移民,地狭人众,粮草给养长期入不敷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山东地区的漕运来解决。如秦

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丞相李斯等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伤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⑧西汉初年首都所需供养有限,“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⑨。至汉武帝时长安人口膨胀,“诸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⑩。元封元年(前110年)间,“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⑪,达到了漕粮数量的顶峰。后来到汉昭帝、宣帝时,大体上仍维持着每年400万石的水平^⑫。当时黄河漕运在三门峡有砥柱之险,航船触礁毁坏相当严重,不得已在当地改为陆运,再经渭水转漕到长安。这是一项非常沉重的负担,东汉如果继续沿用“以关中制山东”的战略,就需要在长安附近建都,因而带来漕运的巨大开支。廖伯源指出,漕转山东之粮食西入关中,役苦而耗费,也是光武帝舍关中长安而都洛阳的重要原因,并且强调:“光武于建武七年‘二月辛巳,罢护漕都尉官’。此时离建武十二年底统一天下,尚有六年,光武已确定帝国之首都为洛阳,不会变更,此后不复漕运西往关中,故罢护漕都尉官。”^⑬其说可以信从。

其三,不以山东势力为假想敌。笔者认为,刘秀放弃以长安为都城,不采取“以关中制山东”的战略,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没有把山东势力作为东汉王朝建立后的主要假想敌。这里有3个因素:

首先,据林剑鸣统计,在光武帝的32位开国功臣中,“属于南阳、颍川人者廿一名,属于河北的六人;属于关中冯翊、扶风人者四人(其中耿弇先世为巨鹿);属于东莱(今山东境内)一人,这就具体地反映了创立东汉的开国元勋基本上是南阳、颍川、河北的大豪强地主。”^⑭学界因此认为东汉政权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东豪族的鼎力相助,这些豪族并不赞同建都关中并采取各种措施来削弱山东势力,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这是刘秀选择定都洛阳的重要原因。^⑮

其次,东汉统一天下后,面临的形势与西汉不同,刘邦当时担心山东的六国旧贵族与分封疆土的诸侯王可能会造反,从而分裂甚至颠覆他的帝国,所以会接受娄敬和张良的建议,依靠关中的险固和实力来监控制约山东。刘秀则没有面临上述威胁,

六国旧贵族经过西汉政府的多次迁徙,力量大为削弱,在山东已经丧失了发动叛乱的能力。此外,刘秀称帝后分封诸子每人仅有4个县,“是即度西汉末年最小之封国而置制也。”“明、章二帝封国更明以钱谷为准,不以郡县地区为准。换言之,但丰其衣食,无复藩辅之意义矣。”^⑯这样做使得诸侯王占地甚小,也没有实力反叛朝廷。东汉建国主要靠山东豪强支持,还有一些割据地方的异己势力,如淮南李宪,楚地的秦丰,琅邪之张步,东海之董宪,都被刘秀派兵诛灭,并没有危害中央政权统治的巨大隐患,反而是隗嚣、公孙述等关西势力与中央政权抗拒到最后,所以朝廷并不以山东豪族为假想敌。后来光武“度田”激起郡国豪强纷纷起兵反抗,但这些豪强的目的也只是隐瞒田土、少交赋税,并非想要推翻东汉政权,所以在朝廷做出让步后,起兵很快就被平息了。

再次,西汉“以关中制山东”的战略,本身具备浓重的地域扬抑色彩,其各种针对性的措施都带有优待关中人士、削弱山东势力的显著倾向,例如迁徙豪富,禁止黄金、铜铁、马匹与弩弓流向关外,北军与禁军主要用关西人,在关中大兴水利、推广先进农业技术等,都使关中士民获得重视及优惠,而山东人士遭到歧视和打击,其利益受到明显的损害,以致出现了“耻为关外民”^⑰的社会流行意识,这项政策造成山东士民的不满与憎恨。贾谊曾批评朝廷此类作法是“疏山东,孽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于此矣”^⑱。他主张撤除“五关”及其盘查制度,使东西两大区域间通行无阻,表明朝廷对各地居民平等看待,并不偏袒某一地域。“因行兼爱无私之道,罢关一通,示天下无以区区独有关中者。”^⑲因此,东汉政府废止“以关中制山东”的对内战略,消除了两大地域居民之间的地位差别以及由此带来的隔阂,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可见,东汉王朝的建立主要靠山东豪强的支持,朝廷在关东地区没有强大的对抗势力,所以不必躲到关中去防备,更何况当时的关中已经残破不堪,充当不了基本经济区与根据地了。“以关中制山东”战略的废止,节省了漕运与移民的严重耗费,中国东西两大地域的居民在身份地位上趋于平等,中央

政府不再给予关中各种优惠待遇及财政的倾斜投入,广袤的关东在经济上不受政策的干扰,得以正常发展;这无疑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对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很有益处。“五关”虽然被保留下来,其作用也只是检查证件和征收关税,并允许黄金、铜铁与马匹自由流通。黄巾起义爆发前,东汉的山东地区在百余年内并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叛乱,也说明朝廷放弃“以关中制山东”的对内防御战略是正确合理的。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6页。下引《史记》各卷出版信息均同,从略。

②司马迁:《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第2894页。

③司马迁:《史记》卷91《黠布列传》,第2604页。

④参见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2期;庄辉明:《对秦汉“强干弱枝”政策的再思考》,《历史教学问题》2002年第4期;高晓荣:《秦汉时期“强干弱枝”政策考论》,《齐鲁学刊》2014年第3期。

⑤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9-167页。

⑥刘向集录:《战国策》卷19《赵策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41页。下引《战国策》各卷出版信息均同,从略。

⑦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53-3254页。

⑧刘向集录:《战国策》卷3《秦策一》,第78页。

⑨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1页。下引《汉书》各卷出版信息均同,从略。

⑩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1页。

⑪司马迁:《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第2016页。

⑫司马迁:《汉书》卷51《邹阳传》,第2341页。

⑬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⑭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42页。

⑮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第1645页。

⑯刘向集录:《战国策》卷3《秦策一》,第78页。

⑰司马迁:《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第2016页。

⑱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3《蜀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214页。

⑲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81页。

⑳司马迁:《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16页。

㉑司马迁:《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44页。

㉒司马迁:《史记》卷55《留侯世家》,第2044页。

㉓鄂千秋曾向刘邦进曰:“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司马迁:《史记》卷53《萧相国世家》,第2016页。

㉔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56页。

㉕刘向集录:《战国策》卷6《秦策四》,第256页。

㉖史念海:《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面和南北对立的局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

㉗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83页,85页。

㉘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第45-46页。

㉙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9页。

㉚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

㉛参见班固:《汉书》卷76《张敞传》、卷90《酷吏传》、卷74《魏相传》、卷89《循吏传》、卷84《翟宣传》。

㉜司马迁:《史记》卷79《范睢列传》,第2412页。

㉝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1《过秦下》,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页。下引《新书校注》各卷出版信息均同,从略。

㉞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3《壹通》,第113页。

㉟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83页。

㊱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第204页。

㊲班固:《汉书》卷90《酷吏传》,第3653-3654页。

㊳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第202页。

㊴整理小组注释:“奠,疑读为‘填’。填黄金器,镶嵌黄金的器物。”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83-84页。

㊵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附录《津关令简释(订补)》,第187页。

㊶司马迁:《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第2969页。

㊷班固:《汉书》卷50《汲黯传》注引应劭曰,第2321页。

㊸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39页。

㊹杨建:《西汉初期津关制度研究》,第131页。

㊺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85页。

㊻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3《壹通》,第113页。

㊼班固:《汉书》卷4《景帝纪》,第147页。

㊽班固:《汉书》卷7《昭帝纪》,第222页。

㊾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69页。

- ⑤0 司马迁:《史记》卷 88《蒙恬列传》,第 2565-2566 页。
- ⑤1 司马迁:《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第 2886 页。
- ⑤2 司马迁:《史记》卷 110《匈奴列传》,第 2887 页。
- ⑤3 施丁:《谈谈“章邯军”与“王离军”》,《史学月刊》2001 年第 3 期。
- ⑤4 司马迁:《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第 270 页。
- ⑤5 张传玺:《关于“章邯军”与“王离军”的关系问题》,《史学月刊》1958 年第 11 期。
- ⑤6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150《兵考二》引山斋易氏《汉南北军始末序》,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1312 页。
- ⑤7 建元元年七月诏:“卫士转置送迎二万人,其省万人。”班固:《汉书》卷 6《武帝纪》第 157 页。
- ⑤8 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151 页。
- ⑤9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150《兵考二》,第 1311 页。
- ⑥0 班固:《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下》,第 1644 页。
- ⑥1 史载:“(吴)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广不能下。”班固:《汉书》卷 31《陈胜传》,第 1789 页。
- ⑥2 司马迁:《史记》卷 126《滑稽列传》,第 3209 页。
- ⑥3 司马迁:《史记》卷 56《陈丞相世家》,第 2059 页。
- ⑥4 班固:《汉书》卷 2《惠帝纪》,第 91 页。
- ⑥5 班固:《汉书》卷 35《荆燕吴传·燕王泽》,第 1902 页。
- ⑥6 司马迁:《史记》卷 10《孝文本纪》,第 425-426 页。
- ⑥7 司马迁:《史记》卷 106《吴王濞列传》,第 2832 页。
- ⑥8 班固:《汉书》卷 35《荆燕吴传·吴王濞》,第 1913 页。
- ⑥9 班固:《汉书》卷 6《武帝纪》,第 183 页。
- ⑦0 班固:《汉书》卷 6《武帝纪》注引应劭曰,第 183 页。
- ⑦1 司马迁:《史记》卷 58《梁孝王世家》,第 2081 页。
- ⑦2 班固:《汉书》卷 47《文三王传·代孝王参》,第 2211-2212 页。
- ⑦3 邢义田:《〈试释汉代的关东、关西与山东、山西〉补正》,《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08 页。
- ⑦4 班固:《汉书》卷 10《成帝纪》,第 313 页。
- ⑦5 辛德勇:《汉武帝“广关”与西汉前期地域控制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 年第 2 期。
- ⑦6 司马迁:《史记》卷 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第 801-802 页。
- ⑦7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10 页。
- ⑦8 班固:《汉书》卷 14《诸侯王表·序》,第 393 页。
- ⑦9 司马迁:《史记》卷 106《吴王濞列传》,第 2821 页。
- ⑧0 班固:《汉书》卷 48《贾谊传》,第 2234 页。
- ⑧1 梁万斌:《〈津关令〉与汉初之政治地理建构》,《复旦学报》2016 年第 2 期。
- ⑧2 司马迁:《史记》卷 17《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第 802 页。
- ⑧3 班固:《汉书》卷 48《贾谊传》,第 2237 页。
- ⑧4 司马迁:《史记》卷 106《吴王濞列传》,第 2825 页。
- ⑧5 班固:《汉书》卷 19 上《百官公卿表上》,第 741 页。
- ⑧6 班固:《汉书》卷 14《诸侯王表·序》,第 395 页。
- ⑧7 班固:《汉书》卷 14《诸侯王表·序》,第 395 页。
- ⑧8 司马迁:《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第 239 页。
- ⑧9 司马迁:《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第 256 页。
- ⑨0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 3《蜀志》,第 225 页。
- ⑨1 司马迁:《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第 3277-3278 页。
- ⑨2 司马迁:《史记》卷 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 2719-2720 页。
- ⑨3 司马迁:《史记》卷 99《刘敬叔孙通列传》,第 2720 页。
- ⑨4 班固:《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下》,第 1642 页。
- ⑨5 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9 页。
- ⑨6 班固:《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下》,第 1642 页。
- ⑨7 司马迁:《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第 3281 页。
- ⑨8 班固:《汉书》卷 28 下《地理志下》,第 1642-1643 页。
- ⑨9 司马迁:《史记》卷 129《货殖列传》,第 3262 页。
- ⑩0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第 8 页。
- ⑩1 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事业的发展》,第 71 页。
- ⑩2 班固:《汉书》卷 24 上《食货志上》,第 1139 页。
- ⑩3 班固:《汉书》卷 24 上《食货志上》,第 1139 页。
- ⑩4 史念海:《秦汉时代的农业地区》,《河山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 181 页。
- ⑩5 司马迁:《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第 281-282 页。
- ⑩6 冯东礼:《何博士备论注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 年,第 12 页。
- ⑩7 冯东礼:《何博士备论注译》,第 12 页。
- ⑩8 班固:《汉书》卷 99 下《王莽传下》,第 4167 页。
- ⑩9 范晔:《后汉书》卷 1 上《光武帝纪上》,中华书局,1965 年,第 9 页。下引《后汉书》各卷出版信息均同,从略。
- ⑩10 冯东礼:《何博士备论注译》,第 11 页。
- ⑩11 司马迁:《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第 282 页。
- ⑩12 司马迁:《史记》卷 6《秦始皇本纪》,第 276 页。
- ⑩13 冯东礼:《何博士备论注译》,第 12 页。
- ⑩14 冯东礼:《何博士备论注译》,第 12 页。
- ⑩15 冯东礼:《何博士备论注译》,第 11 页。

- ①⑥冯东礼:《何博士备论注译》,第11-12页。
- ①⑦傅乐成:《汉代的山西与山东》,《食货月刊》第6卷第9期,1976年12月。
- ①⑧班固:《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第4193页。
- ①⑨班固:《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第4193页。
- ①⑩范晔:《后汉书》卷11《刘盆子传》,第484页。
- ①⑪范晔:《后汉书》卷19《耿弇传》,第706-707页。
- ①⑫范晔:《后汉书》卷16《寇恂传》,第621页。
- ①⑬范晔:《后汉书》卷16《寇恂传》,第621页。
- ①⑭梁万斌:《东汉建都洛阳始末》,《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1期。
- ①⑮陈寿:《三国志》卷6《魏书·董卓传》注引《续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7页。
- ①⑯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71页。
- ①⑰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18页。
- ①⑱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6页。
- ①⑲司马迁:《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41页。
- ①⑳宣帝五凤年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故事,岁漕关东

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班固:《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第1141页。

③①廖伯源:《论东汉定都洛阳及其影响》,《史学集刊》2010年第3期。

③②林剑鸣:《秦汉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85页。

③③参见朱志先、张霞《析东汉定都洛阳的原因》,《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方原:《东汉都城选址原因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梁万斌:《东汉建都洛阳始末》,《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1期。

③④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上《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29页。

③⑤班固:《汉书》卷6《武帝纪》元鼎三年注引应劭曰,第183页。

③⑥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3《壹通》,第113页。

③⑦贾谊撰,阎振益、钟夏校注:《新书校注》卷3《壹通》,第113页。

Internal Defense Strategy of "Controlling Shandong via Guanzhong" for Qin and Western Han Authorities

Song Jie

Abstract: In order to take precautions against the rebellion of the nobles and princes of the previous Six Kingdoms, both the Qin and Western Han authorities took Guanzhong as the basic economic zone and the site of capital, and adopted an internal defense strategy of "controlling Shandong via Guanzhong". Firstly, a defense line of "five passes" was established along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areas of "Guanzhong" and "Guanwai", and troops were stationed for interrogation and examination. Secondly, the main forces of the country, i. e. the "Northern Army" and the imperial army, which was mostly composed of people in "Guanxi", was stationed in the vicinity of the capital. Thirdly, important granaries and arsenals were set up in Xingyang and Luoyang, and measures called "Guangguan" were taken to improve the defense in depth for the capital and the basic economic zone. Fourthly, provinces and counties were set up in the middle area of "Guanwai" to block the principalities and kingdoms, and various measures were adopted to weaken the power of the kingdoms. Fifthly, the policy was adopted of migrating the former nobles and powerful individuals of the Six Kingdoms to Guanzhong. Sixthly, water conservancy was greatly developed and advance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was promoted in Guanzhong. This strategy was successful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but encountered complete failure in the Qin Dynasty and Xinmang period, and was abandoned in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Key words: Qin Dynasty; Western Han Dynasty; Guanzhong; Shanxi; Shandong; basic economic zone; port rules